

论习仲勋的民族工作思想

李 恬

【提 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习仲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工作思想。他强调要坚持慎重稳进原则，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团结原则，根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这些思想为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习仲勋 民族工作思想 慎重稳进 民族团结 共同繁荣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3-0077-06

民族工作是以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及其社会发展为要旨的社会工作。^①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长期致力于党的民族工作，被称为“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高层领导”^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习仲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情况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方针和政策，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慎重稳进原则，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③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西北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面对西北地区民族纷争不断的复杂形势，迅速平息民族叛乱、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西北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央要求，结合西北地区的特点，习仲勋将慎重稳进、循序渐进的方法灵活应用于西北的民族工作中，积极推动民族问题的解决。

一是纠正新疆工作中的急躁行为。西北地区中的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成分复杂。1950年3月，乌斯满等武装匪徒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胁迫牧民发动武装叛乱。在新疆军区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叛乱最终得以平息。1950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处理问题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未经西北局批准，地方不得擅自处理少数民族内部的各项社会改革问题。然而，在未经中央和西北局同意的情况下，中共新疆分局却提前在牧区开始推行社会改革。在《新疆分局关于在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中，新疆分局提出要开展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根除北疆匪患，安定牧区的社会秩序。指示下发后，农牧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偏差，一些有威望的少数民族头人和宗教人士受到错误抓捕，土匪及敌特分子趁机污蔑中共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局势相当混乱。1952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新疆分局应立即停止对北疆牧区的镇反与改革。

1952年7月，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习仲勋指出：新疆的工作，特别是部队生产和农村减租两个方面的成绩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左”的冒险激进错误虽然是部分的，后果却是严重的。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包括：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准备消灭地牧主经济；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牧合作社；在镇反中打击面过宽等等。^④他强调务必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反对“左”倾冒进。明确首先要抓好安定秩序、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以及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然后根据情况逐渐推进其他包括肃匪、镇反等在内的各项工作。^⑤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

此后，新疆社会秩序重新恢复，西北局势逐步稳定。1953年夏，中共西北局派出的调查小组历经4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证实了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⑥

二是积极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解放战争胜利后，解决西藏问题就被列入了议事日程。1951年底，习仲勋作为中央政府特命代表护送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为了加强西藏的工作，针对入藏干部的思想状况，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护送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彼时西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民族上层。虽然广大下层群众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必须要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因此，西藏的主要工作是加强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加强宗教界的下层和上层、俗人和喇嘛、牧民和农民彼此之间的团结，共同组成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习仲勋对护送班禅进藏的负责同志强调，在西藏目前反封建时机尚不成熟，西藏搞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和主题就是爱国与反帝，要争取和团结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⑦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习仲勋认为在西藏开展工作，慎重稳进才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他说，“稳进”不是不进，而是要多思考，善谋划，应不应当办？这样办了，后果又会如何？这样稳妥地加以推进，每办一步就会有一步的成绩。在西藏有些事情不要怕慢，简单急躁反而会走弯路。他强调，要多帮助、多扶植班禅，在一些方面不能要求过高。“小异”是要有的，保证“大同”就可以。^⑧慎重稳进、求同存异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的思路，争取了班禅等上层宗教人士，维护了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推动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成功争取项谦的投诚。解放后，青海昂拉部落（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的千户项谦公然发动叛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多次要求进行军事进剿，习仲勋指示：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他认为首先要做好政治争取工作，“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⑨。他认为，争取项谦归来，有利于迅速稳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有利于增强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感召力，也有利于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进入果洛区工作以及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有鉴于此，习仲勋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继续进行争取工作，对于已经做过的要继续加强，没有做好的要重新做。在习仲勋的部署安排下，藏

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以及一些寺院活佛、藏族部落头人等共约 50 余人，多次赴昂拉与项谦和谈，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争取项谦投诚。昂拉叛乱的解决，作为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对于民族问题所秉持的一贯主张，“应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可轻用武力，政治应占百分之八十五，军事顶多占百分之十五，因为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⑩

习仲勋的上述思想和实践，既是对中央“慎重稳进”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凝聚了他对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在“事事力求谨慎，力求做得实在”^⑪思想的引领下，西北地区复杂动荡的局势得以扭转。

二、坚持民族团结原则，根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习仲勋始终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强调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⑫。

一是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改。习仲勋认为，西北这个地方是几十个民族生活的大家庭，在西北服务和生活必须注意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任何人离开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⑬鉴于西北地区约有半数土改地区为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情况，习仲勋提出在民族团结基础上进行土改的五条方针：第一，不可强迫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土改，他们的行动必须是自觉的；第二，土改工作要有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参加；第三，务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第四，斗争少数民族地主应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第五，务必采取正确的步骤，先做好争取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然后再来发动群众。^⑭

根据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掌握，习仲勋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广大下层群众有很大的进步性，一方面还必须要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就在这些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⑮1952 年，习仲勋提出了著名的“联合封建反封建”观点，内容包括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保护民族宗教上层过好土改关、保存部分封建而搞掉大部分封建、以对一小部分民族宗教上层开明人士的妥协来换取发动群众的条件，等等。^⑯1953 年西北地区土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其间，推行了汉族农耕区、再是少数民族农耕区、然后少数民族牧区的土改工作步骤，实施中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领袖的经济财产利益，在回、汉冲突尖锐的甘肃临夏地区尤为慎重和细致。应当说，“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为推动西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封建反封建”是党的民族思想在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实践基础上的创新，这一思想被运用到藏族、傣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有力推动了当地以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方式，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是深入群众，了解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民族政策。重视发挥群众工作的作用，是习仲勋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无论主政西北，还是任职中央，习仲勋之所以能推动民族工作有效开展，与其重视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在视察青海塔尔寺时，习仲勋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世代耕作寺院土地，并把收获的麦草供给寺院烧锅做饭当作神圣义务。如果实行土改，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寺院就无法烧火做饭，因此当地居民请求不要土改。习仲勋向上汇报后，西北局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改。这不仅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习惯和情感，也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可。为了加强同少数民族群众的交流，习仲勋提倡

要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说，少数民族同志汉语都学得很好，倒是有些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了很长时间，还不能讲一点少数民族的语言，这不利于同少数民族进行情感交流。除了与民族地区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沟通外，习仲勋还经常深入民族地区与普通民族群众拉家常、交朋友。习仲勋说，要多到群众中去，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多和群众交朋友，多到基层调查研究，这样我们的事情才会好办。习仲勋多到群众中去、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本位思想启示我们，只有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也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进而为加强民族团结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加强宗教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以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习仲勋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广泛团结各阶层、各政治派别及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组成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自然、传统等原因，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其中信仰宗教、具有宗教情感是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突出且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特征。因此，这些地区的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相交织，呈现出复杂性和敏感性并存的特点。习仲勋指出，对宗教具有深厚的情感因素，在民族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中是普遍存在着的，这种客观存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待相关情况，务必要认真研究，慎重处理，决不可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为此，他强调民族地区的干部一定要与宗教人士广泛接触，特别是要处理好与宗教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了解宗教领袖人物的情况，以便开展工作。^①

基于上述认识，习仲勋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北地区工作期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人士保持着广泛和经常性的接触。习仲勋曾谈到，解放初期，“在甘肃，大规模的回民叛乱有两次，一次占了平凉城，一次我们伤亡将近两千人，最后怎么处理的？武的办法不行，还是由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去出面和平解决。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②而在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归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是习仲勋深情厚谊的挚友。这说明在民族工作中，务必要根据民族特点办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情感，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加强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以此来凝聚共识推动工作。

三、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习仲勋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要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④

一是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解放初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十分落后，为了解决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大力推动自由贸易，陆续在青、甘、新、宁四省区建立了二百多个贸易专业机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为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还先后组织了大约六百五十个左右、形式多样的流动贸易组。这些贸易小组和机构较低的价格向少数民族群众大批量地出售布匹、茶叶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药材、皮货等土特产品，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因此而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习仲勋明确提出，新的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大力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进入新时期，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成为经济建设首当其冲的问题。习仲勋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逾越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可是，就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少数民族连记账的习惯都没有，有的甚至还处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补上商品经济这一课，他提出可采用专家调研、帮助开发、培训专业人才、加强横向联系等解决办法。他强调，在民族工作中，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中，都要把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在首位。为促进新时期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各部门以及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力量都积极开展了少数民族智力支援工作，为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习仲勋认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方面，“走出了新路子，取得了新成绩，创造了新经验”，开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对此予以鼓励和肯定。^{②1}

二是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特色呈现于文化，也根植于文化。马克思认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②2}其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②3}。在交流互动中，文化民族性被赋予新的内涵，并获得时代规定性。

习仲勋充分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精华，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习仲勋主张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则要在交流中创造性地充实发展，成为“共同的财富”。他指出“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发展，要相互交流，特别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本民族的文化。”^{②4}他说，“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原盘端过来，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把原有的水平加以提高和发挥，这就是创造。”^{②5}习仲勋主张尊重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差异，区别对待各民族的文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地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政府曾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津等地参观交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渠道和机会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予以推介。^{②6}政府还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拨出数量可观的经费，兴建中、小学校，让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学习本民族语言。^{②7}任职广东后，习仲勋专门指示拨钱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队文化事业的发展。^{②8}

三是积极培育少数民族干部。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就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少数民族干部懂得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党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习仲勋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既要培养领导干部，又要培养管理干部、技术干部与和科研人员。为就近服务和帮助少数民族，同时，推动西北民族学院尽快筹建，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办公地址就由陕西西安迁至甘肃兰州。在西北民族学院的一次开学典礼中，习仲勋说，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着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完成这一任务，就能为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推动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创造出最基本的条件。这也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大家务必要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民族工作方面，任何事都不会比这件事更重要。^{②9}1986年11月，他在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干部中像乌兰夫这样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素养的还很少，应该多培养和选拔一些乌兰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干部。习仲勋认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党性强、专业硬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对

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⑳

习仲勋对党的民族工作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既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也是当代中国追梦圆梦的力量源泉。我们要深入学习习仲勋在民族工作上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不断书写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刘宝明 《关于民族工作的几个理论问题》，哈尔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2期。

②《习仲勋秘书：老领导曾告诫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西安《陕西日报》，2013-10-12。

③从1950年3月始，习仲勋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勋肩上。见《习仲勋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1、197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84页。

⑤⑥习仲勋 《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7月15日。

⑦⑧习仲勋 《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做好争取昂拉千户问题给青海省委的复示，1951年9月30日。

⑩习仲勋 《西北工作的特点是做好民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⑪⑫⑬⑭⑮⑯习仲勋 《西北工作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⑰习仲勋 《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⑱习仲勋 《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⑲阎明复 《追忆习仲勋对我的教导》，《怀念习仲勋》编辑组《怀念习仲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⑳习仲勋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

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2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㉒㉓习仲勋 《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0、1123页。

㉔《习仲勋文集·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000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㉖郭湛主编 《社会公共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㉗《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㉘习仲勋 《关于文化统一战线问题》，《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㉙㉚《习仲勋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㉛《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㉜习仲勋 《在西北民族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作者简介：李恬，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重庆市委宣传部社会思想动态研究中心副教授。重庆 400015

[责任编辑 刘慧玲]